

秘方

文/宗崇茂

“菖蒲二两、黑公猪肉四两，用瓦罐熬，同汤一起吃了，连吃五期，你的耳朵就能好了。”

姨妈晚上来到我家。因为听说我的中耳炎最近犯得厉害。她不知从哪儿找来了秘方，而且把原料都带来了。

怕我老婆不会熬，姨妈又亲自示范，熬出第一锅药。药带有菖蒲的清苦香。一边吃，一边心里暖着。

不一会儿，我的胃部开始感到不适，想吐。也许是吃多了？睡下，愈感不适。爬起来吐了一次。回床。又爬起……似乎连苦胆也已吐出，丝丝血腥气替代了菖蒲的清苦香。

那一夜，我一次又一次想到了父亲——

父亲蹲在小厨房的门前。他在默默地剥一只癞蛤蟆的皮。我们兄妹几个，远远地看着，包括一向胆小的母亲，像是在看父亲做一个残忍的游戏。我们甚至还微微地皱起眉，心怀些许的恶心。但他的儿女们要他活下去。知道自己患了癌的父亲也想活下去。他正在按照我寻回来的一

剂民间秘方，给自己配制药物。而癞蛤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料。

挣扎于汪洋中的人，即使天空中飘下的一根雨丝也会被他紧紧抓住。得来的秘方被我记在了纸上，摆在他面前，像是一道他不得不签的军令状。父亲无奈一笑：“好吧，我吃，死马当作活马医吧。”

于是，他自剥，自煮，自吃。有时，癞蛤蟆从他的刀下突然挣脱，他跛着病腿又去追了回来。怕我们感到不适，吃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尽量避开我们。偶尔，从他佝偻的背影我能判断出他下咽时的艰难。可怜的父亲，他正承受着双重的夹击——来自病痛的，来自治疗病痛的药方的。只见他伸长脖子，喉咙中不停地发出“咔咔”的声音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明知徒劳，但我们还是期望他能够忍受下去，还是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经受这种伤害。心疼是徒劳的。悲悯是徒劳的。因为死亡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过程——也许这才是死亡最不人道的地方。

父亲人缘好。村中人在田头

看到癞蛤蟆从眼前跳过时，都会立刻想到我的父亲，想法子捉住，然后送到我的家中。为此，对送来癞蛤蟆的每一个人，父亲总是千恩万谢。那一个夏天，父亲不知吃下去多少只癞蛤蟆。

后来，父亲坚决不肯再吃了。是由于对秘方失去信心，还是因为实在弄不动了也咽不下了？不得而知。

死亡之神不久就带走了父亲。

我不止一次地这样想：早知这样，不该让父亲去遭受这份罪的！也许能找出一百个理由开脱自己，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，正是我的那一点点孝心，伤害了父亲最后的尊严。

数天后，姨妈询问我秘方的效果。我硬是忍着，没把实情告诉她。我怕她知道后，要么对我失望，要么对寻求秘方这件事深感懊悔。如果那样，无异于又一次伤害的发生。■



旧影
摄/吉龙生

背磨盘的故事

文/赵瑜

一则背磨盘的故事，如果无人提及，必被历史遗忘。这件事有位目击者，他是文革前担任山西忻县地委秘书长的马如龙先生。忻县，现称忻州。故事不长，立此存照。

1967年2月，造反派夺了忻县地委大权，且将老干部们关押一年多，然后劳改。劳改农场位于原平县东常村。1969年，全县农村正在痛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。马如龙从所在劳改队，前往农场附近一座小镇劳作，看到了奇异一幕。马如龙先生回忆道：

我们来到小镇，只见人群拥挤，这里正在赶庙会，那时叫物资交流，还搭起了临时舞台，要唱样板戏。忽然，听到阵阵敲打铜锣的声音，我看到，一位20多岁的后生，脊背上背着一块沉重的砂石大磨盘，总有40多斤重，压弯了腰。汗滴黄土。他胸前挂着一块纸牌子，上书“搞资本主义的黑干将·刘兴国”。听人们说，这是一个民办教师，家里祖传磨豆腐，那块大磨盘就是磨豆腐用的。刘兴国手提铜锣，一边敲锣开道，一边挂牌游街。在他身后，跟着七八条汉子，身穿黄色军大衣，系着帆布腰带，臂上戴着红布袖章，一直押着刘兴国来到群众前面，又把他推上舞台中央。锣声停止，公社的王副主任摇摇摆摆走到台前训话。他高声批判说：最近，有些人财迷心窍，不顾集体，还敢偷磨豆腐，发豆芽，私自出售，有的人贩卖猪娃子，卖红薯秧，破坏学大寨运动！都看看嘛，这个站在台上的刘兴国，他们父子俩，早上四点钟起床磨豆腐，一大早走街串巷卖豆腐，劲头可大哩！可是一到集体地里劳动，就吊儿郎当没了精神，这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？我们叫他背磨盘游街，就是整一整这个黑典型。王副主任还批判说：刘兴国身为民办教师，给革命下一代造成了恶劣影响……

王副主任训话，农民们黑压压地听着，或者麻木，或者不满，但谁也不敢反对。突然，人群中猛地站起一位大姑娘，身材苗条，明眉大眼，十分秀气。只见她毫无惧色，打断了台上的大批判，用纯正的北京话大声说：乡亲们，社员们，人家起早摊黑劳动，工余时间磨了点豆腐，一不雇工，二不放高利贷，还方便了群众，挣几个小零钱，凭劳动过日子，算什么资本主义呀？

这番话讲得有理，会场上一下子炸了锅，社员群众对着姑娘发出一

片喝彩声。听那姑娘的口音，讲话清亮，就知道她是来自北京的插队知青。有这位姑娘带了头，当场有人响应，不少人对着台上高喊：要文斗不要武斗，背磨盘游街就是搞武斗！又有人喊：凭什么不许磨豆腐？让刘兴国把磨盘放下！在一片喊声中，露天剧场上演激情难抑，出现了预想不到的混乱局面，这就说明了人心所向。

刘兴国哈着腰，在台上委屈地流下泪来。

主持会议的王副主任非常尴尬，只见几个头脑急急商议了几句，王副主任这才宣布：为了不影响群众看戏，批判会到此结束！几个打手押着刘兴国匆匆忙忙离开了会场。

事后得知，刘兴国被押到公社，住了半个月学习班，撤销了他的民办教师资格，回村监督劳动。那位伸张正义的北京女知青，也被强行收到公社学习班挨整。

20年过去，我无法忘掉这一幕，我记挂着勤劳的刘兴国，也记挂着那位可敬的北京姑娘。1989年，我担任了忻州地委书记，又到那里下乡调研。我专门打听当年背磨盘游街的刘兴国，现在怎么样？

一问才知道，那场悲剧变成了喜剧。

那场庙会之后，公社把刘兴国和北京姑娘同时押在学习班挨整，却不知，他俩心往一处想，泪往一块流，反而建立了诚挚的感情，同情也变成爱情，第二年两人就成了亲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两口子承包了土地，重新安好磨盘，又开办了豆腐作坊。传统小作坊信誉高，质优味好，群众支持，产品供不应求，两口子很快把石磨换成了钢磨，把手摇变成了电动，进一步扩大经营，雇了三名帮工，加工豆腐皮、豆腐干，办起了豆类加工厂，盖起了小洋楼，生活就像鸟儿长硬了翅膀，飞起来了。知道了如此结局，我真替他们高兴，替农民高兴。

马如龙先生这个故事：背磨盘街，侠女侠义，寓意深广，令人联想到一个团圆式的中国传统故事，先苦后甜，又像一部纪录片，十分冷酷。故事中北京女知青的侠义善举，折射了一种民间情绪，一种思想勇气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良知，也反映了苦难农民心底的愿望。只因为那场大革命，深深地侵害了中国农民的利益。

北京女知青挺身抗议，不是孤立的。让我们永不背负沉重磨盘。■

吴叔叔柯明

文/高欢

吴叔叔柯明先生原名吴樾，于2014年7月13日在美国匹兹堡市因病医治无效逝世，享年92岁。

吴叔叔就这么走了，在92岁的高龄。遗憾和悲伤。但也确实是高寿了。阿弥陀佛！愿他往生路上勿经八难！他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在我父亲母亲的同事中，他真是可敬的！这第一可敬的是为人，第二是他的才华，还有就是他的幽默。在他的一生中，真是有太多太多的爱恨情仇。从民国到新中国，又到了“美帝国主义”的美国，这三个时代，真是三三得九。

我算了算，前三十年，中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终结。他出生于国民政府的高干家庭，也就是现在说的官二代。当时蒋委员长过大寿，他是首都好学生代表，曾为蒋委员长献鼎。可想而知，这在那个时代都是极大的殊荣。我想他一定是最三好学生。在那个时代，他绝对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叛逆青年，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极为反感。

在国民政府撤退台岛的前夕，他受中共地下党的动员，孤身留下，迎接民主自由的新中国。他那时在南京已是很有名气的著名青年漫画家之一了，在《中央日报》就职。解放后，他与我的父母同在新华社工作的美术组工作，任美术组组长，那时他的漫画作品与大名是三天两头见报的。新华社的美术组是当时报社最有趣最好玩的办公室。不过，吴叔叔可没少受罪，被怀疑；被审查；写交代；受批

判，革命运动没完没了。这些事情都是在我父母下班之后窃窃私语中听来的。我那时在鼓楼区一中心小学读书，学校的大门右手边的第一个院落就是他的家，有时中午我会沿着上海路、华侨路，跑去爸爸妈妈的单位食堂混饭吃，路上常常碰见他，他总是提着个黑皮包，低眉顺眼地低着头走路。那时候小小的我，脑袋里阶级斗争这根弦是紧绷着的，怎么人一会好一会又变成坏人了？这让我非常纠结。有一次听我父母说他又倒霉了，在路上碰见我，他看了我一眼，我愣在那儿，一直很有礼貌的我却没有招呼他，这几十年前中午邂逅的情景一直伴随着我，是什么心情，我一直在想。我觉得很过意不去，这个抱歉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纠结着。

文革中，他们全家也下放了，去了苏北的金湖县。后来他又与我的父母在同一个单位江苏省出版社工作。我们住得很近，在鼓楼附近的青云巷一带。他很喜欢跟小年轻玩，我们兴趣相投，对民间美术有着共同的兴趣。我们那时跟他玩的一群人，有叶兆言、原小民、速泰熙、朱新建、卢新民等。

改革开放了，他玩录音机，极喜欢台湾歌手邓丽君。邓丽君的歌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对亲情的思念。他玩摄影，背个相机在新街口一带满街拍美女。他还为我拍过我抱着女儿在新街口逛街时的照片，黑白的，拍得好极了。他玩什么都是发烧友级的。他总是夸我的图章刻得好：